



中世纪的 欧洲大学

(第一卷)

——大学的起源

THE UNIVERSITIES OF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

海斯汀·拉斯达尔 著

崔延强 邓磊 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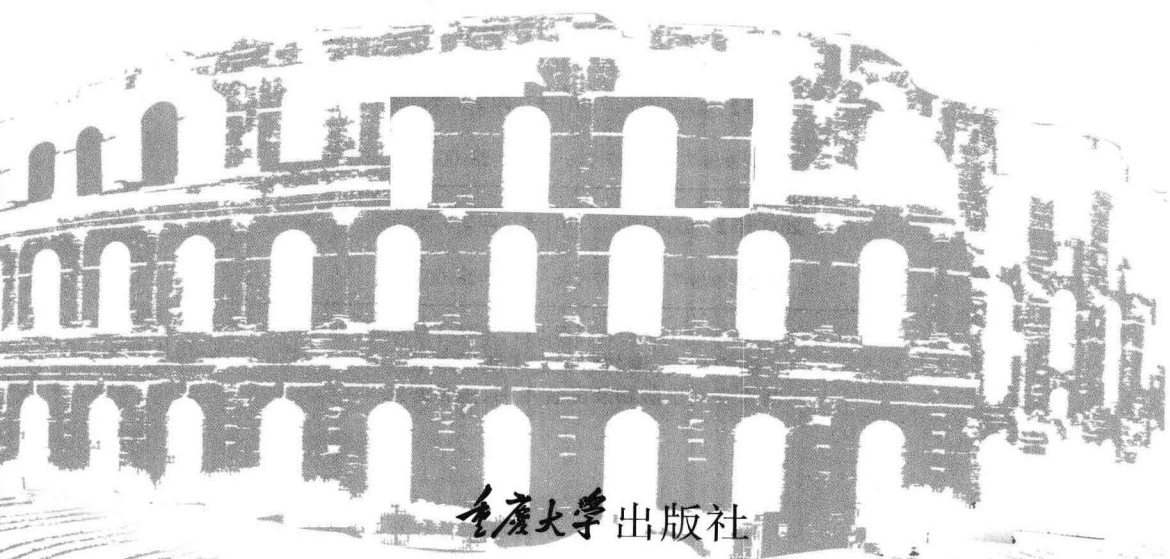
<http://www.cup.com.cn>

中世纪的 欧洲大学

——大学的起源

海斯汀·拉斯达尔 著

崔延强 邓磊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世纪的欧洲大学——大学的起源/(英)拉斯达尔
(Rashdall, H.)著;崔延强,邓磊译. —重庆:重庆
大学出版社,2011.2

(“大学:思想与制度”书系.第1辑)

书名原文:The Universities of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

ISBN 978-7-5624-5717-6

I. ①中… II. ①拉…②崔…③邓… III. ①大学—
研究—欧洲—中世纪 IV. ①G649.5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47056号

中世纪的欧洲大学——大学的起源

海斯汀·拉斯达尔 著

崔延强 邓磊 译

策划编辑:唐启秀

责任编辑:唐启秀 叶霞 版式设计:唐启秀

责任校对:张洪梅 责任印制:赵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邓晓益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正街174号重庆大学(A区)内

邮编:400030

电话:(023) 65102378 65105781

传真:(023) 65103686 65105565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东南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开本:720×1020 1/16 印张:13.75 字数:185千

2011年2月第1版 2011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 000

ISBN 978-7-5624-5717-6 定价:28.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知识的献祭：中世纪大学的精神遗产

——《中世纪的欧洲大学》(三卷本)代序

大学滥觞于12世纪的欧洲。在意大利中部,有一所叫博洛尼亚的大学,是有史可稽的最早的大学,至今依然人声鼎沸,香火旺盛,大约有6万人的规模。还有哲学家阿贝拉尔曾经战斗过的巴黎大学,以及稍晚一些的牛津、剑桥、萨勒诺、海德堡、科隆等大学,都是中世纪知识传承的中心。

大概世界上还没有一种社会组织如大学这般古老而常新。寿命最长的经济组织不过200年不到,政治组织的寿命更短。大学则不因政治的风云变换、改朝换代而飘摇不定,也不因生产方式的革命而被革命。为什么大学可以经千年而不衰?是什么东西使大学在时间的洪流中坚挺如初?必定是一种精神,大学所特有的一种精神。因为任何制度都可以被命运击碎,唯有精神才是永恒。只要精神在,制度就在;精神不在了,制度便随风而去。大学制度长寿的秘密就在于其一以贯之、绵延不绝的大学精神——那就是学术自由、大学独立、追求卓越。

大学的精神财富应当追溯到中世纪。“黑暗”的中世纪不是绝对地伸手不见五指。欧洲人学会逻辑理性思考、运用亚里士多德博大的知识和犹太人炽热的信仰改造日尔曼人精力过剩的躯体和荒蛮的心灵,肇始于中世纪(见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大学正是改造心灵的产物。

最早的大学(*universitas* 或 *studium generale*)和城市的其他行业组织的性质一样,属行会性质。人们要吃饭,就要有吃饭的看家本事。12世纪的欧洲城市于是就有了专门销售和购买这些本事的职业群体——知识分子。他们和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不一样,一开始就是生

于“草根”，自谋生计、自食其力，没有一个从政治中心、从主流群体游走出来，落于“草根”、沦为边缘的过程。自古中国知识分子属于士、农、工、商“四民”之首，垄断知识生产与再生产，一条科举大道把读书人的命运与官僚科层体制紧紧联系起来。1905年的某一天这条改变命运的大道突然坍塌，读书人一夜之间手足无措，纷纷涌向政治的边缘，落草为工、为商、为兵，“四民之首”不复存在。从民国初年的被动落难，到“五四”时代一部分人的积极高呼“劳工神圣”，直到最后终于带上“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光环，这一精神蜕变过程不可谓不痛苦，用杨绛先生的话说，叫知识分子的集体“洗澡”。这一落差不可谓不大，心理适应起来异常艰难，都100多年了，还是有些不舒服。今天的各种入学考试制度，似乎还在重温昨日的科举旧梦，创造了举全球无双的壮丽风景：在每年的那一天早晨，警察扎断交通，护送着“考子”们迎着一轮朝阳走进考场。一旦走进大学，尤其读了硕士、博士，再也不愿做搬运工和的士司机了。这叫“知识改变命运”。“博士毕业卖猪肉”，在科举出仕的文化习惯里是很难接受的。在欧洲，知识分子自始至终就是劳动阶级的一部分，准确的说法是小生产者的一部分。为了保护自身的知识生产利益，他们结成行会组织，这就是师与生的综合化组织 *universitas*，不断与地方的宗教、政治、世俗势力抗争。他们不像我们的书生负笈云游，而是为了面包和房屋于街头巷尾天天与市民摸爬滚打。如果师与生们不高兴了，大旗一挥，离开巴黎，巴黎的经济陡然滑坡，市井萧条，于是当政者和教会逐渐认识到大学对一所城市的繁荣是何等的重要，赶紧发布包括办学自主、法律特赦令在内的各种优惠政策，招引师生回来。甚至在巴黎街头学生与市民发生纠纷导致命案，学生也可免于刑罚。大学的自治权利是一步步争取来的。早期的大学分学生行会和教师行会。学子们以地缘为纽带，也就是“老乡 (*nations*)”集聚一起，选出一名校长 (*rector*) 负责管理，共同出资聘请教师传业，因此对教师有严格的要求。如不得无故缺课、迟到早退，离开城镇要交保证金；如果少于5名学生听课，就要受到罚款；讲授的进度也有规定，一学期下来，如果只讲一个导论或书目，磨磨蹭蹭，有混饭吃的嫌疑，立刻解聘。而教师行会也有自己的一套规矩，最拿捏学生的就是“准入”机制。如要从事教师职业，必须进行论文答辩，通过后发给“执教许可证”，准予上岗营业。许可证，与学位制度有着渊

源关系，是最早形式的学位。意大利以学生大学为主，而法国的教师大学居多。这个传统延续下来，至今意大利的学生自治权利很大，稍有激动，打碎学校或城镇的玻璃则是家常便饭。

说起学生自治来，一直是我们国内大学民主建设的一个“盲点”。形式上有些校务向学生公开，但学校核心问题以及学生切身利益问题的决策，基本不会想到学生的意见，估计旁听的资格都不会有。哪怕老师的课把学生讲得一个不剩，也会照旧滔滔下去。今天吃包子还是吃干饭，还会征得你的同意？我们的习惯是做好了就得吃，没商量。早晚吃出问题来，才想起原来大学里还有学生存在。谁是大学的主体？显而易见。在我们眼红今日西方大学生的自治权利时，别忘了人家有近千年的历史，人家是习惯动作。我们的传统是“师道尊严”。当什么“教育主体”，参与什么民主决策，那些是长者的事情，没长胡子的莫去遐想。

最早的大学只有四科，自然生成的四种学术组织。上帝说，洞悉生命必须要了解生理构造，所以有了医学的必要；上帝说，洞悉生命还需了解人的精神世界，所以有了包括七艺在内的“自由教育”，即基础文、理学科；上帝说，洞悉生命应研究人与社会的关系，所以必须开设法律；上帝说，洞悉生命最终要进入信仰领域，所以神学是所有科目的归宿。一开始这些科目是单独组织的，如巴黎的神学、博洛尼亚的法学等。后来，这些独立科目慢慢拓展，联合形成综合性大学的胚胎。有时我们纳闷，为什么知识的学习非得把各科目捆绑在一个大学的院子里？为何不可分开单独开设？大概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要从不同角度切入，综合考察，交叉感知，形成完整印象。或许这是综合性大学存在的必要性吧。在永恒主义观念的影响下，欧洲的综合大学一直没有工程技术类的科目。在德国 19 世纪才出现若干单科高等技术学校，它们生长于大学的墙外。当年蔡元培模拟德国经验创办北京大学，也如法炮制，不设工科。如今北大以文理见长，其工科不及某些单科院校，除了 20 世纪 50 年代初的院校调整因素，和蔡先生留下的这份精神遗产不无关系吧。应用性科目走进英国大学，也是很晚的事情。工业革命发生在大学院墙之外。19 世纪 70 年代后，古老的剑桥青春勃发，剑水两岸的高新技术产业春笋般冒了出来。为生计所迫，牛津慌忙迎战，增设一些实用科目。19 世纪 80 年代中期牛津始设工

商管理。但对学位,现在西方世界依然强调基础学科的时间性和神圣性。不少应用学科不设博士学位,即使有博士项目,其地位远不及 Ph. D 那么“神圣”,因为“理论之树常青”。

顺便说一下,极具我们中国特色的“石油工业大学”“冶金工业大学”如果翻译出去,估计老外听不懂。按国际惯例,大学(university)仅指以文、理学院为基础的,间或加上其他一两个专业性学院的综合性大学。一所综合性大学原则上要有三大学院,一是基础文、理学院(art college),一是专业性(如工、医、农等)学院(professional school),一是研究院(postgraduate school)。如澳大利亚只有 8 所 university,其他均为独立设置的 college。综合性大学应精而少,多数应是行业性的技术学院或社区学院,如见满大街跑的十有八九都是“大学”精品,找不到工作那是必然结果。近些年来,我们的大学类别、定位和功能已经搞乱了。把大学的服务功能从“平行”变成“立体”,似乎大学越大水平就越高,大学比单科学院身高一等,那些本来办得好好的学院为了“摘帽”、“升格”而疲于奔命。专升本、本升硕、硕升博,放弃了优势,背离了市场,搞得上不上下不下,悲乎! 我们的高等教育。

中世纪大学另外留给我们一个宝贵遗产是“答辩”制度。问与答,这种辩论推理的方法、讲堂技术和文章形式培养了自由、平等、民主和追问真理的思维习性。这种思维习性逐步沉淀、凝结为文教制度而巩固下来。进入这种制度的人逐渐独立于宗教政治力量,成为一个分化的社会结构。当时的大学毕业生必须接受全体学生和教师答辩委员会的诘难(questio),往往需要一两天的工夫。只有通过问与答的艰辛心路历程,才能使灵魂攀缘上升,逼近真理。此时人人可提问,你要接受来自四面八方质疑的利箭。真理从来不是躲在暗沟里见不得阳光照射的软体动物。前几年到泰国,参观了曼谷近郊一所叫“易三仓”的私立学校,屋舍堂皇,结构独特。基座为佛门莲花图案,顶端是伊斯兰城堡造型,庭院一钟楼则是天主教堂模样,象征大学之道“并行而不相悖”。见过一个答辩厅,平时不开放,但窗明几净,一尘不染。听众席,呈阶梯状,环绕四周。正中间一桌一凳是答辩人就位的地方,有置身罗马斗兽场的感觉。答辩人正前方的最高处是答辩评委席,高背椅子,庄严肃穆。我想,答辩在这里举行一定是一件神圣非凡的活动,答辩人“痛”并神圣着! 因为,在沐浴了真理风暴的洗礼之后,一旦

从这里健步走出，你就对得起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校长亲自挑过流苏的博士帽和颁发的毕业证。中世纪的大学学位，是由主教或其他高级神职人员授予的。仪式一般在教堂或露天进行。师生及家长来宾济济一堂，摆放一些瓜果饮料，以示收获。今天的校长服是大红色的，大概就是红衣主教留下的遗风。学士学位拉丁语叫 *bachelor*，来自骑士制度，指见习或低级骑士。刚刚大学毕业，还不能独立门户当先生，后面没有追随门生。硕士学位 *master*，表明已获得当主人、从事独立职业的资格了。而博士学位，属于具备深厚学养的资深学者，像神学大师托马斯·阿奎那被授予“天使博士”称号。

大学无国界。大学的世界品格，是中世纪大学在那个特殊时代背景下留给后世的精神财富。当时的学生使用同一种语言——拉丁语，拥有同一种信仰——基督教，因此他们不管走到哪里，凭着手里的《圣经》都能找到“同志”，受到热情款待，当然是免费的。今天大学之间的学术交换项目多少还残存着远古遗风。大学的世界性格是支撑一所现代大学国际化程度的精神支柱。而国际化程度——教师的国际化、学生的国际化、学术语言的国际化、学术成果的国际化，又是衡量一所大学办学水准、学术视阈的标志。前不久，忽看到英国某评价权威机构对亚洲大学的最新排名，内地无一家大学进入前十名。我们深知，建设“国际一流大学”，其国际化程度是一种怎样的分量！

正如我们翻译的这部中世纪大学研究最具权威的经典作品的作者拉斯达尔所言，中世纪大学的荣耀是“知识的献祭”，它像黑夜中的一盏明灯，照亮通向现代精神的道路。

本书翻译历时三载，个中艰辛自不待言。弟子邓磊赴美访学期间，孤灯相守，冷餐为伴，匍匐在词语的密林中，孜孜锲锲，日夜不辍，终成译稿。有如此似我当年之门生，乃为师者莫大的快慰。如今，幸得一称心如意的好学生难乎升教授、做博导。是为序。

崔延强

2010年5月20日于西南大学

译 者 序

自 1884 年起,伟大的英国历史学家海斯汀·拉斯达尔开始撰写《中世纪的欧洲大学》,直到 1895 年,历经将近十二个年头,才完成了这篇鸿篇巨著。著作甫一问世,立刻被推为经典之作,1936 年再版时,该书更臻完善;直到现在,其仍被奉为中世纪大学研究方面最权威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拉斯达尔以详实的史料、开阔的视野,对大学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多层次、全方位的论述,该书共分 3 卷:第一卷探讨大学的起源以及萨勒诺、博洛尼亚和巴黎大学的兴起和发展;第二卷对各国相对次要的大学进行介绍,包括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德国、波西米亚、低地国家、波兰、匈牙利、丹麦、瑞典等;第三卷则集中探讨英国大学,尤其是牛津和剑桥大学。作为一个以史料见长的牛津学者,拉斯达尔对每一个细节都给予充分的史料支撑,同时给予适当的评论,让读者在掌握史料的同时又能享受到倾听历史的愉悦。尤其要指出的是,作为一个神学家和哲学家,拉斯达尔对中世纪的思想极感兴趣,所以在此书中大学组织的形成发展又总是与当时伟大的思想家如欧内乌斯(Imerius)、格拉蒂安(Gratian)、阿贝拉尔(Abelard)、阿奎那(Aquinas)、奥卡姆(Occam)等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从而将大学的组织发展与当时的思想学术发展联系在一起,这也为后来的研究模式奠定了基础。译者认为,为了更好地掌握这部巨著的神髓,抓住作者的思想主线以及了解行文背后的时代背景是至关重要的,另外也有必要对原著篇章的结构以及行文内容的注释做出一定的调整。

首先,鉴于“学生大学”与“教师大学”两种原型大学的泾渭分明,以及原著第一卷过于浩瀚的篇幅,译者将第一卷拆分成两个部分——大学组织的起源以及意大利学生大学、大学组织的发展以及巴黎教师大学——进行介绍,至于仅占原著内容不到五分之一的第二卷,正如拉斯达尔自己在“第一版序言”里所说的那样:“除三所原型大学(这里作者将牛津也视作与博洛尼亚和巴黎并肩的原型大学)外,笔者用316页的篇幅高度浓缩地论述了76所大学的内容;当然,这种处理方式使得本研究的部分工作除作为参考资料外,不具备任何让读者们感兴趣的地方。”因此,译者决定将本卷暂时放在一边,继续进行第三卷——英国大学的介绍以及中世纪大学的总体评论——的翻译工作。也就是说,经译者整理后的四卷本《中世纪的欧洲大学》,前三卷将是原著第一卷、第三卷中的内容;至于第二卷,译者计划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作为中文版四卷本的第四卷进行介绍。

其次,由于原著的注释主要是对文中所涉及的引文和资料出处的解读(对于一个严谨的历史学者而言,这种方式是在意料之中的),但是,作为一部译著,并且是牵涉众多中世纪历史人物与政治、宗教背景的经典著作,对于原著字面背后的背景介绍则绝对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在译著三卷本的前两卷译者将大量插入有关历史人物与事件的注释,原著中的注释内容则较少出现;在第三卷中,由于主要任务和历史事件业已大多在前两卷中交代清楚,因此“译者注”的出现机率将会大大减少,而原著注释的内容则会相对完整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之所以采用这种前两卷以“译者注”替代“作者注”的情形,一方面是为了全面展示书中的内容,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时间和精力有限,不得已而做出的选择。在此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中文材料的匮乏,“译者注”中相当一部分的内容源自于英文版的维基百科,尤其是中世纪教会人物和政治人物的介绍。

以上是译者对原著内容所自行作出的改动,尽管出于种种客观缘由,但不妥之处也必然存在,译者在此恳请诸位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作为未来重新修订译著的参考。

为了方便众位读者更加深入地研读《中世纪的欧洲大学》这样一部卷帙浩繁的著作,译者认为有这样几个问题比较发人深省:

一、大学何谓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首任校长，伟大的当代高等教育家克拉克·克尔 (Clark Kerr) 在其《大学的功用》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著名的论述：

在 85 个创立于公元 1520 年之前、至今仍然一脉延续、拥有相似功能和不间断历史的西方机构名单中，包括少许主教座堂，爱尔兰、冰岛议会，以及大不列颠、瑞士的几个州议会；另外，就是接近 70 所的大学。当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专制王朝、封建领主和垄断行会都已烟消云散，这 70 所大学，依然矗立在相同的地址，沿袭着同样的称谓；仍然有教授和学生在一些古老的房子里做着大致相同的事情，遵循着一脉相承的治理方式。

从蒙昧的黑暗时代到现今的知识社会，从茕茕独处的母型大学到开枝散叶的现代高校，从遗世孤立的“象牙塔”到拆去围墙的综合大学……千年而下，大学的面目早已从低调朴素、位于社会边缘的稚女，华丽地转身成为光辉绚烂、贵为天之娇子的公主。的确，大学，早已物是人非；但是，在容颜的变幻之后，恒久未易的是一脉相承、使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的核心理念与主体精神。无论是封建时代，抑或后工业时代、战乱时代，抑或和平年代，大学的核心理念与主体精神都从未丢弃。因此，在《中世纪的欧洲大学》这部著作中我们最需要弄清的问题就是：这些精神和理念究竟是什么？它们从何而来？又何以能够一路迤迤而来却从未迷失？或者，用最简单的语言表达，大学是什么？何谓大学？

二、大学之源

为了回答前文中提出的问题，我们就必须回到源头，去解读从那个被人们认为黑暗蒙昧的时代中所迸发出来的文明曙光与知识献祭。

正如海斯汀·拉斯达尔开篇所论述的那样：

圣职主义、帝国主权以及高等学业，这三者曾被一位中世纪作家

赋予了至为神秘的力量与“德行”。正是这三者丝丝入扣的通力协作，才保证了基督世界长久安定的生存空间。在这三者之中，“圣职主义”以及“帝国主权”所代表的都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唯有“高等学业”，才是切实存在的实体组织。众所周知，所有的教士特权都可以溯源到“七山之城”（Seven Hills，罗马城的别称）的宗教领袖和权威；同时所有的世俗统治最终也都要归结为神圣罗马帝国的荣耀；毋庸置疑，那些灌溉和滋润了普世教会的知识溪流也有着各自的源头——伟大的原型大学，尤其是巴黎大学。对于一个在中世纪学者眼中具有如此崇高地位的机构进行历史探究，这项工作绝非简单的考古好奇。事实上，中世纪高等学府的起源、发展、衰败及其向现代模式的转型，都值得我们如同对待教皇权力以及神圣帝国那样持之以恒地进行大量的研究。

因此，巴黎、博洛尼亚这两所母型大学，连同后来自成一派的牛津、剑桥等英国大学，就是自中世纪以来最伟大的大学之源。我们之所以关注《中世纪的欧洲大学》，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要溯源而上，寻找现代大学精神的滥觞，从而为大学理念去伪存真，为现代大学的发展正源清流。

三、大学之用

对中世纪大学进行全方位的审视和研究，究竟对于今天大学的发展具有多少现实的意义？或者说，中世纪的大学对现代教育制度有着怎样的影响？这个问题也应当是研读《中世纪的欧洲大学》这部著作的主要目的之一。

拉斯达尔告诉我们，中世纪的时代天赋，首要的就是体现在其所创建的高等教育机构上。中世纪大学对于人类历史的意义可能比其他的一切机构都更加不可磨灭，甚至比同时期的教会组织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学是中世纪最独特的贡献，现代社会所有学校的习俗、制度和称谓，都需要追根溯源到13世纪以降的学者行会和大教堂学校；尤其是巴黎大学教师团与巴黎大学校长（即巴黎主教座堂主事）的伟大抗争史，更是大学理念得以诞生的千古绝唱。毋庸置疑，正是这一

切的传承和异变,才造就了今日的大学;但令我们好奇的是,究竟这些中世纪的历史馈赠在多大程度上仍然影响着今日的教育机构?

在大多数现代人们的心目中,“中世纪”这一称谓就是“理想主义”的代名词,也是一个坚信,甚至滥用“大学”理想的时代。若果真如此的话,那么我们如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何在高度文明的古代欧洲却并不存在大学形态的教育?为何无论是古希腊,还是亚历山大大帝时期的学校,都不能被冠名为“大学”?此外,从中世纪大学教育中,我们究竟能抽取出哪些有利于现代教育发展的信息?对于这些问题,拉斯达尔将在本部著作中一一进行回答,相信读者们也能够从中找到自己的解读。

邓 磊

2010年9月于西南大学杏园

前言

本书的写作,缘自笔者 1883 年一篇获得牛津大学校长基金的英语论文。原本笔者只是打算将这篇历时一年完成的论文稍事修订和扩充,然后便以专著的形式发表出来。但意想不到的是,这项“修订与扩充”的工作竟然持续了将近十二年的时间。虽然研究主题的跨度和难度需要研究者付出持之以恒的努力,但 12 年的时间对于任何一位熟悉该领域的历史学者来说似乎都显得太久。只是由于笔者是在动笔之前对中世纪的教学情形仅仅一知半解,因此才不得不付出如此之多的时间。

本研究的开展面临着多方面的困难,其中的一个就是近年来忽然大量涌现的关于中世纪大学的著作和古代文献印刷品。当笔者刚刚着手进行该项研究时,无论是对整体的中世纪大学还是对其中某个主题的研究,都不存在所谓的权威之作。因此,笔者不得不对巴黎大学几百年的发展历程亲自进行发掘,去弄清那些在杜·布雷(Du Boulay)厚厚两大本的《巴黎编年史》中亦未涉及的历史事实。但不久之后的 1885 年,德尼弗勒神父(Father Denifle)^①便出版了《中世纪大学的兴起》这部伟大的著作。其中披露了大量新颖而真实的史料,从而

^① 德尼弗勒神父(1844—1905)意大利古文书学家、历史学家,道明会学者。德尼弗勒神父曾遍访欧洲各主要国家图书馆,后利用担任梵蒂冈档案馆副馆长的机会,于 1885 年出版了材料翔实的《1400 年前的大学》,推翻了布拉伊的研究结论,开列出几十个从教廷文献中重新发现的中世纪大学名单,使中世纪高等教育的研究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应巴黎大学邀请,德尼弗勒神父整理出版了这所大学的早期历史资料,并在四年之后出版了《巴黎大学文件汇编》和两卷《文献补编》(1894—1897)。(转引自涂尔干·教育思想的演进·李康译,第 87 页)——译者注

也使得笔者前期的一些资料搜寻变为徒劳。随后,德尼弗勒神父与钱特雷(Chatelain)再接再厉,又连续出版了多卷本的鸿篇巨著《巴黎大学档案集》(1889, 1891),而作者此时关于巴黎篇章的修订以及对其他引文的补充工作正接近尾声。当德尼弗勒神父的第三卷著作来到笔者手上时,笔者本人的文字已开始付印。1888年,博洛尼亚大学的800周年庆典又催生了一大批文献资料的问世,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便是马拉戈拉编纂的完整版《博洛尼亚法令集》。在此之前,有关该大学法令的出版著作统统都是不完整的。而傅立叶则在此时完成了法国大学文献汇编的壮举(这篇伟大的三卷本著作分别出版于1890、1891及1892年),其中包括对除巴黎大学之外其他法国大学篇章的重新撰写。有关一些特定大学的法典、注册簿、教皇谕令集以及历史事件记录也迅速地相继出现。自笔者开始着手进行中世纪大学的历史研究工作以来,值得关注的相关出版资料库几乎出现了将近一倍的扩充。至此,基本上所有大学的大学法令集皆已付梓出版,同时在大部分情况下各种存世的文献资料也已经尽善尽美地被整理编纂完毕。但不幸的是,我们英国的大学却并未受到同等的待遇。

鉴于当前日益完善的中世纪文献资料的出版工作,笔者认为没必要再费时费力地去寻找相关的手稿来作为本研究的佐证。如果完全依靠原始手稿的求证,笔者就务必要在国外的图书馆或资料室中虚度经年,而且很有可能当笔者的著作尚未付梓,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又已经出版。因此,在进行牛津、剑桥、圣安德鲁斯以及巴黎等大学(在很小的范围内)的历史研究时,笔者打破了完全依赖原始手稿资料的规则。关于巴黎的历史研究,鉴于现今已经公开出版著作的完整和真实,笔者认为除需要对学生注册记录方面的原始资料进行简单的处理之外,其他方面基本上没有必要再去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尽管如此,笔者还是对法国国家图书馆珍藏的相关重要原始文献进行了查阅。关于英国大学,笔者认为对未出版原始文献的熟稔有助于对新鲜历史观点的阐释,同时也可以对早期的学院发展进行更好的理解与阐述。虽然牛津大学手稿文献的数量十分庞大,但由于罗伯特·海尔(Robert Hare)以及布莱恩·泰恩(Bryan Twyne)等考古学者不知疲倦的转录和整理,查阅的便利性业已大大提高。然而,如马克·帕提森(Mark Pattison)所言:“手稿文献中写不出真正的历史”,笔者深以为

然。因此,笔者与此同时还要查阅众多的官方文献并将其编年排列,以便于我们更加便捷地理解它们的重要意义。希望在不久之后,牛津大学能够结束这样一段尴尬的历史——由于早期历史文献公开出版的稀缺,牛津大学是目前唯一无法对自己的早期历史进行系列研究的重要大学。这项工作也只能靠牛津自己来完成,因为对于任何私立的社团来说,该任务都显得庞大了,而且英国政府也不会为此等无法给他们提供政治资本的科学研究提供研究经费。剑桥大学未出版的文献虽然也比较可观,但相比牛津而言便相形见绌。

本丛书计划对三个伟大的原型大学——博洛尼亚、巴黎与牛津,进行相当全面的描述;同时还准备以国家为单位,对其他一些古老大学的组织创建、章程制定以及历史沿革进行一些简要的介绍。在研究展开之前,笔者甚至连三所原型大学的历史沿革都未从事过专门的研究,更不用说其他的大学了。许多大学在历史上曾经坐落的行政区域,在今天的欧洲地图上已经不复存在。而且它们在历史上曾经从属于某个区域,但随着历史的变迁其从属的行政区域也已经更改。鉴于上述原因,笔者对各所大学行政区域的归属问题,将按照最自然、最简单的整体划分方式来进行处理。

由于需要在相对有限的研究范围内处理如此庞大的历史体系,因此笔者就会对大学发展过程中的诸多问题进行比较简单的处理,或者甚至完全不会提及。首先,本研究的着眼点在于各大学的章程发展史,就此问题,在未能对各大学的思想史做出一定的理解和阐述之前,笔者所能做的也仅限于对几位相关专家的著述进行阐释。但是,笔者还是对经院哲学、神学的成长以及法学、医学学科的发展做了一定的介绍,以作为中世纪教育机构发展的补充,使其更加易于理解,同时也能够充分揭示其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除三所原型大学外,笔者还将拿出一定的篇幅高度浓缩地论述 76 所欧洲大学。当然,这种处理方式使得本研究的部分工作变得除作为参考资料之外不具备任何让读者们感兴趣的地方。更加糟糕的是,这种仅仅关注最知名者却对其他学术研究机构采取忽视态度的做法,极有可能导致读者无法准确、全面地把握中世纪大学系统分布广阔、形式多样的特性,同时也无法充分体现中世纪大学在欧洲文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意义。不仅如此,如果不具备对其他所有大学的熟稔,甚至就连每一所大学的历史也无法

完美的呈现。此种大学历史的研究手法之所以存在巨大缺陷，就在于放弃了类比研究的应用。由于方法论方面存在的不足，甚至就连学生们也很可能直接跳过对第二卷的大部分篇幅——对几十所大学浮光掠影的介绍——的阅读。而对于“普通读者”们而言，恐怕第三卷的最后一章（对中世纪大学的述评）才是他们最感兴趣的所在。

对于本研究存在的缺陷，笔者本人有着最深刻的洞察。如果要消除这一问题，可能还要再耗费笔者数年的时间。当然，笔者也可以逐一指出尚需完善的地方以供有识之士进行深入的研究。笔者之所以在研究尚未完善之前便付梓出版，其原因就是由于该研究的旷日持久，业已使得笔者感到必须要将已经完成的内容立刻出版，否则该项工作极有可能让笔者穷尽一生的时间。另外笔者还认为，对于中世纪大学历史的研究，基于所有存世的文献几乎都已经付印的基础上，十余年的时间已经可以使这项研究告一段落了。同时，笔者也希望自己的文章能够为现今正在致力于有关中世纪大学史课题研究的广大学子提供一些有益的帮助。

毋庸置疑，当前有关中世纪大学史主题的研究都在大量借鉴他人的研究成果。在本研究中，笔者也在一些特定大学的表述中借鉴了其他历史学者的研究成果。但在此笔者尤其特别需要向德尼弗勒神父的杰出成就致敬，德尼弗勒神父是当代唯一一位对中世纪大学进行全面研究的学者，从他那里，笔者得到了丰富的资源和有益启示。或者说，如果没有德尼弗勒神父这位先行者的话，笔者的研究将更加的新颖、更加富有原创性。由于传统文献中存在着如此之多的谬误和曲解，这也给了德尼弗勒神父这个第一位严肃对待该课题的现代学人清腐祛弊的绝好机会。尽管如此，可以肯定的是这位先行者的工作依然存在着片面和偏差。在此，为了公正地澄清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笔者将所有的问题归结为以下几点内容：

1. 有关巴黎大学早期历史最重要的部分，作者直接引用了德尼弗勒神父对原版的修订工作。其他有关此方面的一些文献则来源于《英国历史词典》，这部著作中有一些关于大学介绍的短文，笔者对其进行了引证和阐发。

2. 本研究所接受启发的程度，取决于德尼弗勒神父所做工作的原创范围。通过对梵蒂冈以及其他一些档案馆的搜寻工作，德尼弗勒神